

欧加登战争与国家建构^{*}

卢凌宇 古宝密

【内容提要】 迄今为止,对国家建构的“战争驱动模型”的研究大多使用统计工具进行大样本分析,在因变量设置方面严重忽视了国(民)族认同,在研究设计上则是“因素中心”导向,导致了重战争形式、轻战争过程的结构缺陷。为弥补以上缺陷,本文通过“结果中心”导向的研究设计,对欧加登战争(1977—1978年)前后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个参战国财政汲取能力和国族认同进行有限追踪和分析。本文发现,国家建构的两个指标在埃索两国都大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一方面,战争对两国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虽然战争能促使国家强化官僚机器对社会的控制和汲取能力,但糟糕的经济状况提供不了足够大的税基,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依然较低。另一方面,战争对国族建构总体而言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是起到消极作用。国际战争对国族建构的影响是条件性的,在国内存在族群叛乱的情况下,国际战争有可能进一步削弱国族建构。

【关键词】 欧加登战争 国家建构 索马里 埃塞俄比亚

【作者简介】 卢凌宇,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电子邮箱:poooc@ynu.edu.cn

古宝密,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gubaomigbm@163.com

^{*} 本文是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非合法性暴力对发达国家能力的影响研究”的前期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科学》三位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深刻、中肯和极具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文中尚存的错漏,概由作者负责。此外,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硕士生赵迎节和贺丽楠两位同学为本文的个案研究提供了文献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7卷第1期(总第25期),第149—185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埃塞俄比亚(以下简称“埃塞”)与索马里在欧加登(Ogaden)地区的争端由来已久。索马里独立后,两国因欧加登问题多次发生冲突,虽冲突规模不大,但两国间的敌意逐渐公开化。^① 巴雷(Mohamed Siad Barre)上台后着手运用武力解决此问题。1977年夏,索马里出兵欧加登,战争爆发。索马里在战场上曾一度占据优势,但在决定性时刻,苏联向埃塞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索马里虽也向外寻求援助,但未能扭转战败局面。1978年4月,欧加登战争基本结束。战后,埃索两国继续处于对峙状态,是典型的国际关系中的“对手”(rivalry)。对手是指国家间存在的一种准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对峙的国家面临着现实的战争威胁,不断为可能到来的战争进行动员和战备。^②在1960年至1988年,埃塞和索马里的对峙持续整整29年,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间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对手之一。^③

欧加登战争尽管并没有对两大阵营间的缓和状态造成明显影响,但对交战两国双方的影响则是长期而深远的。^④战争对埃索两国各自的国家建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如何实现的?更重要的是,欧加登战争对埃索两国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由蒂利(Charles Tilly)所开创的国家建构的“战争驱动模型”?该案例对于模型的完善又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启示?本文旨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本文正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有关战争对国家建构影响的主要文献的梳理与评价;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设计,重点探讨案例的选择和结果变量的测量;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则深入分析和比对了欧加登战争对埃索两国财政汲取能力和国(民)族认同的影响;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① Brigadier Joseph Nkaiserry and Colonel Daniel Henk, *The Ogaden War: An Analysis of Its Causes and Its Impact on Regional Peace on the Horn of Africa*, Carlisle Barracks: U. S Army War College, 1997, p. 10.

② Richard Stubbs, “Wa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1, No. 3, 1999, pp. 337-355.

③ William Thompson, “Identifying Rivals and Rivalrie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5, No. 4, 2001, p. 571.

④ Gebru Tareke, “The Ethiopia-Somalia War of 1977 Revisited,”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3, No. 3, 2000, p. 666.

在对个案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蒂利的“战争驱动模型”进行完善。

一、国家建构的“战争驱动模型”

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般而言,广义的国家建构指政治精英建立、巩固和重建国家能力、组织机构和合法性的过程;狭义的国家建构则侧重于国家机器或组织机构建构。简言之,广义的国家建构包括狭义的国家建构以及通常所谓的国(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从经验看,这两个过程往往并驾齐驱,相互强化。^①

当代世界政治的实践表明,成功的国家建构“几乎始终是国内政治的产物”。^② 尽管如此,国际战争或国际冲突却是解释国家建构的主流范式之一。这个范式最早可以追溯到韦伯(Max Weber)和早期的亨策(Otto Hintze)^③,其集大成者则是蒂利^④。斯普鲁伊特(Hendrix Spruyt)将该范式与资本主义经济/国际贸易、主权国家制度并列为近现代欧洲国家兴起的三大解释。^⑤ 张孝芳认为,蒂利的“战争驱动模型”不仅与功能主义(强调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精英冲突(强调精英之间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利益冲突)并驾齐

① 关于对国家建构这个概念的综述和讨论,可参见 Bruce Jones et al., “Concepts and Dilemmas of State Building in Fragile Situations: From Fragility to Resilience,” in OECD/DAC discussion paper, *Journal on Development* (off-print), Vol. 9, No. 3, 2008, pp. 13-14.

② Marina Ottaway, “Rebuilding State Institutions in Collapsed State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3, No. 5, 2002, p. 1015.

③ Thomas Ertman, “Otto Hintze, Stein Rokkan and Charles Tilly’s Theory of European State-Building,” in Lars bo Kaspersen and Jeppe Strandsbjerg, eds., *Does War Make States? Investigations of Charles Tilly’s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33-70.

④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查尔斯·蒂利:《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类似于有组织犯罪》,彼得·埃文斯等编著、方立维等译:《找回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228—261 页。

⑤ Hendrik Spruyt,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Possible Decline of the Modern Stat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 No. 1, 2002, pp. 127-149.

驱,构成现代国家建构的三个原生模型之一,而且还是其中最具解释力的理论。^①

蒂利理论可以概括为“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wars make state, and state makes wars)这个经典命题。具体而言,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过程中(990-1992年),统治者们面临域内外武装集团的挑战,被迫进行长期的备战和作战。为此,统治者们不得不向社会汲取资源,代价是为被统治者提供安全和保护。在资源汲取、备战和战争的过程中,国家组织得以大规模扩张。由于税收的刚性,被战争推高的税收水平会在战后得以维持,从而巩固了战争期间膨胀起来的国家机器。在这个过程中,战争推动了欧洲现代国家的形成(见图1)。^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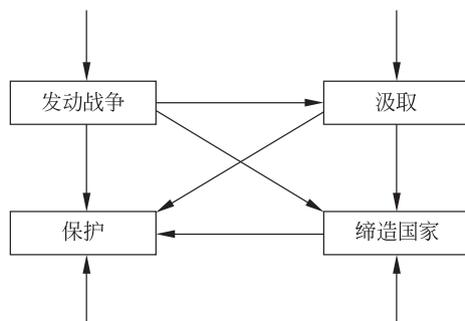


图1 查尔斯·蒂利的“战争驱动模型”

注:图中的“发动战争”等于国际战争,“缔造国家”指国内战争。

巴尼特(Michael Barnett)深刻地指出,国家建构的实质是调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没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政府缺乏动力而且也很难重构国家和社会间的契约。^③巴尼特等人把蒂利模型的精髓归纳为“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面临战争所产生的巨大安全威胁,政府必须实行经济、社会

^① 张孝芳:《从欧洲之内到欧洲之外:现代国家形成理论的演进》,载《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8期,第83页。

^② 查尔斯·蒂利:《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类似于有组织犯罪》,彼得·埃文斯等编著、方立维等译:《找回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49页。

^③ Michael Barnett, *Confronting the Costs of War: Military Power, State, and Society in Egypt and Isra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0.

和政治改革,大幅度调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为了应对社会的反抗,国家不得不建立新的官僚机构和扩张已有的国家机器来积极应对。战争期间急剧扩张的政府税收、支出、政府机构规模和人员数量等具有很强的黏性,不会显著降低,国家建构因此得到大幅度提升。^①

从逻辑上讲,战争也可能会削弱国家建构,产生某种“弱化效应”(debilitating effect):国际冲突会腐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政府为了备战和作战,不得不和社会讨价还价以汲取资源,为此不得不缩小国家的权力范围,并让社会在政府相关决策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后果是社会的相对权力得以扩大。^②然而,这个命题能够成立取决于一个默认的前提:在一个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控制政治权力,社会控制资本。然而,在当代世界政治中,国家建构被视为后殖民和欠发达国家的专利^③,这些国家显然难以满足这个前提。

简言之,蒂利命题的自变量是国际战争,因变量是国家建构。^④从知识演化的角度看,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科学命题往往会经历正、反、合三个发展阶段。具体而言,在第一阶段,这个命题会得到大量的理论加固和经验支持;在第二阶段,挑战性的理论建构和经验证据开始出现,学术争论由此展开;在第三阶段,原生的简单命题逐渐演变成以条件性命题为主的知识体系,这里的“条件”可能是自变量或因变量的约束条件,可能是新增的干预变

① Karen Rasler and William Thompson,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Governmental Expenditures, Tax Revenues, and Global War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No. 2, 1985, pp. 494-495.

② Michael Barnett, *Confronting the Costs of War: Military Power, State, and Society in Egypt and Israel*, p. 3.

③ Verena Fritz and Alina Menocal, “Understanding State-Building from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An Analytical and Conceptual Paper on Processes, Embedded Tensions and Lessons for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Report for DFID’s Effective and Fragile States Teams, Sept. 2007, pp. 4-5.

④ 希伯里(Ulrich Sieberer)认为,如果研究设计是结果导向的,不必区分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参见 Ulrich Sieberer, “Selecting Independent Variables: Competing Recommendation for Factor-Centric and Outcome-Centric Research Designs,” in Thomas Gschwend and Frank Schimmelfenning, eds., *Research Design in Political Science: How to Practice What they Preac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 168-171.

量,也可能是对命题在时间和空间适用性上的限制。“商业和平论”这个研究纲领的演化则较为充分地体现了这样的发展轨迹:从奥尼尔(John Oneal)和拉西特(Bruce Russett)到巴比里(Katharine Barbieri)、再到科普兰(Dale C. Copeland)和彼德森(Timothy Peterson)^①，“商业和平论”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学中一个成熟的议题。

然而,自蒂利阐发其原生模型以来,国家建构的“战争驱动模型”从第一阶段直接过渡到了第三阶段。尽管蒂利的原创研究引起了强烈而持久的批判,但这些批判罕有颠覆式的反击,而是表现为替代性解释、衍生性解释以及对蒂利理论的修正和补充。

桑地诺(Miguel A. Centeno)等学者的研究似乎证伪了蒂利的理论。桑地诺指出,拉丁美洲各国没有经历过整体战和全面战争,社会内部冲突使得该地区各国不堪重负,相关国家无法认真应对国际军事挑战,从来没有充分对社会进行过军事动员。相反,零敲碎打的有限战争和冲突是国际冲突的常态,它们削弱而非强化国家能力。^②然而,许田波(Victoria Hui)中肯地指出,这些学者并没有证伪蒂利的理论,而是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③蒂利的观点具体来说可以表述为:频繁且高强度的国际冲突强化了国家能力。桑地诺等人的观点则可以表述为:稀缺且低强度的国际冲突削弱了国家建构。所以,蒂利和桑地诺共同构成了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除桑地诺之外,巴尼特考察了1948—1952年埃及和以色列的政治史和财政史。在此期间,两国经历了第二、三、四次中东战争,其中埃及还参加了也门战争。巴尼特发现,

① Dale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1996, pp. 5-41; Katherine Barbier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3, No. 1, 1996, pp. 29-49; Timothy Peterson, “Dyadic Trade, Exit Costs,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8, No. 4, 2014, pp. 564-591.

② Jeffrey Herbst, “War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4, No. 4, 1990, pp. 117-139; Michael Desch, “War and Strong States, Peace and Weak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2, 1996, pp. 237-268.

③ Victoria Hui, “How Tilly’s State Formation Paradigm is Revolutioniz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State-Making,” in Lars bo Kaspersen and Jeppe Strandsbjerg, eds., *Does War Make States? Investigations of Charles Tilly’s Historical Sociology*, pp. 269-270.

两个国家的国家能力都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原因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社会的高度控制逐渐转化为社会控制国家。^①本文认为,巴尼特的研究也不构成对蒂利理论的证伪。首先,埃及和以色列国家能力的变化呈现为先升后降的过程,至少部分印证了“战争缔造国家”这个命题。其次,社会科学理论都是概率性的,蒂利的理论得到了大样本统计分析的强有力支持。^②其一,两个个案虽然会略微拉低命题为真的概率,但并不足以推翻大样本统计分析的结果;其二,巴尼特设置的主要因变量是“国家自主性”,提出国家能力是指国家机器中可供国家管理者在日常社会治理中使用的持久资源,以及有效约束和限制这些国家管理者行为的社会约束。^③他认为,国家只有独立于强势的社会团体,才能赚取更多的收入,国家能力才会更强大。与巴尼特相反,蒂利则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渗透水平,即国家并不独立于社会强势团体,而是尽可能地渗透到社会中,采用强制手段或谈判等方式与社会进行博弈以获取所需的资源,在操作上体现为财政汲取能力。因此,虽然汲取能力和自主性都属于国家能力的范围,但其内涵大不相同,所以不期待出现相同的结果。

对蒂利原创理论的替代性解释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近现代以来欧洲国家的形成。例如,戈尔斯基(Philip S. Gorski)指出,不是国际战争而是基督教新教的律令和加尔文主义运动才是民族国家在欧洲得以生成的原因。^④衍生性解释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对蒂利模型自变量或因变量进行替换。例如,布莱兹(Lisa Blaydes)和派克(Christopher Paik)指出,十字军东征为后继的国

① Michael Barnett, *Confronting the Costs of War: Military Power, State and Society in Egypt and Israel*, p. 11.

② 例如 Cameron Thies, “War, Rivalry and State 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9, No. 3, 2005, pp. 451-465; Lingyu Lu and Cameron Thies, “War, Rivalry and State Building i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6, No. 2, 2013, pp. 239-253; 卢凌宇:《战争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1期,第4—39页等。

③ Michael Barnett, *Confronting the Costs of War: Military Power, State and Society in Egypt and Israel*, p. 42.

④ Philip Gorski, “The Protestant Ethic Revisited: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Holland and Prussi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9, No. 2, 1993, pp. 265-316.

家建构提供了若干必要条件,比如消灭了大量的社会精英以及开征人头税等。^①更为常见的是对经典理论的修正和补充。1100—1789年,在欧洲发生军事技术革命和频繁战争的同时,国家规模显著下降,国家数量急剧增加,这些特征大致从低地国家经莱茵区延伸到意大利北部;而西欧其他地区的状况符合蒂利模型的推论:国家数量越来越少,国家规模越来越大。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城市化水平的不同。^②而且在战争这一变量外,蒂利本人也曾指出:“强盗行径、海盗行为、黑社会的竞争、维持治安和发动战争都属于一个连续的统一体。”^③

蒂利模型之所以影响深远,不仅是由于它对欧洲国家发展史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且还在于该理论在欧洲以外的世界得到了验证。^④尽管如此,蒂利本人对其理论在欧洲以外地区的适用性持保留的态度。在他看来,一方面,随着殖民时代结束,许多在欧洲推动了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国家的内部斗争并没有在后殖民国家得到复制;另一方面,在后殖民时代,国际战争的合法性急剧下降,难以像在欧洲变革过程中那样起到巨大的作用。^⑤贝茨(Robert H. Bates)等学者也指出,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变化更为敏感。比如,国际法对国际战争的严格限制和全球金融体系所提供的融资便利等,

① Lisa Blaydes and Christopher Paik, “The Impact of Holy Land Crusades on State Formation: War Mobilization, Trade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edieval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0, No. 3, 2016, pp. 551-586.

② Kivanc Karaman and Sevket Pamuk, “Different Paths to the Modern State in Europ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arfar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Regim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No. 3, 2013, pp. 603-626.

③ 查尔斯·蒂利:《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类似于有组织犯罪》,彼得·埃文斯等编著、方立维等译:《找回国家》,第230页。

④ Jeffrey Herbst, “War and the States in Africa,” pp. 117-139; Lingyu Lu and Cameron Thies, “War, Rivalry and State Building in the Middle East,” pp. 239-253; Miguel Centeno, *Blood and Debt: War and the Nation-State in Latin America*,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⑤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 D. 900—199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asil Blackwell, pp. 190-191.

都会影响到当代国家的能力建构。^①不过,主流的观点却认为,发展中国家与近现代欧洲具有巨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②

蒂利经典理论在近现代欧洲以外地区和国家的应用和发展主要是衍生性和补充性的。比如,将国际冲突替换为国际(战略)对手、跨国反叛组织、军事干预、外国占领等。^③同时,也有学者把蒂利理论推广到战后重建这个研究领域。^④此类研究的主体是修正性和补充性的,通常的做法是在自变量(国际冲突)和因变量之间添加若干干预变量,或者对自变量或因变量做出相应的修正。比如,迪森科(Mark Dincecco)和王裕华(Yuhua Wang)认为,自然地理条件所造成的“退出成本”(exit cost)差异是解释近现代欧洲未能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早在公元前3世纪秦国就统一了全中国的原因。^⑤

总体看,蒂利模型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他把民族国家的崛起视为战争的非意图后果。无独有偶,波齐

① Robert Bates, *Prosperity and Viole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68-75.

② Keith Jagers, "War and the Three Faces of Power: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5, No. 1, 1992, pp. 26-62; Cameron Thies and David Sobek, "Wa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4, No. 1, 2010, pp. 267-287.

③ 参见 Stephen Stedman, "Spoiler Problems in Peace Process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2, 1997, pp. 5-53; Alan Kuperman, "The Moral Hazard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Lessons from the Balka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2, No. 1, 2008, pp. 49-80; Jeffrey Pickering and Emizet Kisangani, "Foreign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Post-Colonial State-Building: An Actor-Centric Analysi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31, No. 3, 2014, pp. 244-264.

④ Marcus Cox, "State Building and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Lessons from Bosnia," Cluster of Competence The rehabilitation of war-torn societies A Project coordinated by the Centre for Applied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CASIN), Geneva, January 2001, pp. 1-23.

⑤ Mark Dincecco and Yuhua Wang, "Violent Conflic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ver the Long Run: China Versus Europ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1, 2018, pp. 1-18.

(Gianfranco Poggi)也持相同的观点。^①相对于蒂利的经典模型,后续研究大体仍将国家建构视作战争的非意图后果。值得一提的是,赫布斯特(Jeffrey Herbst)在其经典论文中建议国际社会应该允许非洲国家进行大规模的领土吞并战争,通过自然选择的方式优胜劣汰,让幸存者从杰克逊(Robert Jackson)所谓的“准国家”或“法理国家”转变为“经验国家”。^②

第二,蒂利对国家建构的定义主要是物质主义的,止于狭义的国家建构。^③后来的学者大体继承了蒂利的这一思想遗产,并在经验研究中将模型的因变量操作为财政汲取能力。较早期研究中的一个例外是赫布斯特,他在对后殖民非洲国家建构的研究中,将国族建构引入了分析。他明确地指出:“明显外部威胁的存在可能是在国家与人口之间建立共同联系的最强方法。外部威胁对国族主义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因为人们深刻地意识到……只有作为一个国家,他们才能成功战胜威胁。”^④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认为外部军事竞争迫使统治者强化军事力量,为此必须采取措施,实现民族团结、扩大军队和官僚机构,并大幅度提高国家收入,这是所谓的“激励效应”(stimulating effect)。^⑤泰勒(Brian Taylor)和博泰亚(Roxana Botea)则将民族建构引入了对二战后越南和阿富汗国家建构的比

① Gianfranco Poggi, *The Stat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p. 65-68.

② Jeffrey Herbst, “War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pp. 117-139; Robert Jackson, “Quasi-States, Dual Regimes and Neoclassical Theory: International Jurisprudence and the 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4, 1987, pp. 519-549.

③ 查尔斯·蒂利:《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类似于有组织犯罪》,彼得·埃文斯等编著、方立维等译:《找回国家》,第246—251页。

④ Jeffrey Herbst, “War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pp. 117-139. 有必要一提的是,虽然蒂利及其后继者较少将国族主义尤其是非洲国族主义用作因变量,但政治学家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涉及殖民主义与非洲民族主义的形成及特点、非洲民族主义的代际更替、非洲民族主义与战争的关系等,可参考 Stephen van Evera, “Hypotheses on Nationalism an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4, 1994, pp. 5-39; James Fearon and David Laitin, “Violenc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4, 2000, pp. 845-877.

⑤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2-123.

较个案分析。^①

第三,蒂利虽强调国际战争,但对旨在剪除国内反对派的国内战争也给予了较多关注,所以蒂利所谓的“战争”实际上包括国际和国内两种战争。然而,在蒂利之后,问题的自变量设置要么侧重于国际战争或冲突,要么直接忽略国内战争或冲突^②,导致蒂利模型逐渐演化成国家建构的“国际战争模型”。实际上,论及对国家建构的影响,由于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的性质大不相同,它们的作用机理和路径也大异其趣,在当代政治中尤其如此。比如,国际战争往往被视为对整个政治共同体生存或发展的威胁,而国内战争则很可能是国内族群压迫的结果。所以,国家建构的“战争驱动模型”包括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两个亚型。^③

第四,蒂利认为欧洲现代国家形成是“战争、资源汲取和资本积累”共同、序贯和相互作用的结果。^④许田波据此指出,蒂利把时间和过程引入了模型,强调过程而非结果,是一种“机制”解释,而不是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构建的那种结构主义理论。^⑤不过,后续研究放弃了对多因素平等、共同、序贯驱动国家建构的机制路径,转而探讨战争影响国家建构的约束性条件。套用格施文德(Thomas Gschwend)和希美尔芬尼格(Frank Schimmelfennig)的类型学划分,蒂利之后,“战争驱动模型”就从结果导向

① Brian Taylor and Roxana Botea, “Tilly Tally: War-Making and State-Making in the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1, 2008, pp. 27-56.

② 后者比如 Stephen David, “Explaining Third World Alignment,” *World Politics*, Vol. 43, No. 2, 1991, pp. 233-256.

③ 关于内战的国家建构效应,较近的文献可参考 David Sobek and Camberon Thies, “Civil Wars and Contemporary State Building: Rebellion, Conflict Duration, and Lootable Resources,” *Civil Wars*, Vol. 17, No. 1, 2015, pp. 51-69; Abbey Steele, “Constraining the Samurai: Rebellion and Taxation in Early Modern Jap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1, No. 2, 2017, pp. 352-370.

④ 查尔斯·蒂利:《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类似于有组织犯罪》,彼得·埃文斯等编著、方立维等译:《找回国家》,第230—233页。

⑤ Victoria Hui, “How Tilly’s State Formation Paradigm is Revolutioniz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State-Making,” in Lars bo Kaspersen and Jeppe Strandsbjerg, eds., *Does War Make States? Investigations of Charles Tilly’s Historical Sociology*, pp. 268-269.

变成了因素导向,即从探讨众多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序贯地产生某一结果,转向研究对某一个或少数几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的显著性、方向和强度。^①

二、案例选择与变量设置

本文是理论导向的政治学研究。罗尔芬(Ingo Rohlfing)对此类研究做了一个类型学划分,包括以下3个理想型。类型1:研究目的是修正(已有的)假说,特点是基于现存理论,假说形成于经验分析之后;类型2:研究目的是建立新的假说,特点是并不以某个理论为参照系,假说同样形成于经验分析之后;类型3:研究目的是检验假说,假说形成于经验检验之前。^②显然,从逻辑推理类型来看,类型1和类型2属于归纳,都是探索性的(exploratory),而类型3则是演绎和确证性的(confirmatory),它也是主流的常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本文属于类型1,在程序上假说将形成于案例分析之后。相应地,本文也就不存在确证性研究的理论建构这个核心内容。

具体而言,我们将通过考察欧加登战争前后参战双方的国家建构水平,来探索使得蒂利的经典理论成立的附加条件,然后从个案研究中提炼出若干可供后续研究的假设或猜想。作为一个修正性研究,本文的参照系主要是蒂利的经典模型。同时鉴于欧加登战争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所以我们还将比对蒂斯(Cameron Thies)和卢凌宇对战争与该地区国家建构关系的代表性论文。^③蒂斯将蒂利模型直接应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认为该地区虽然国家间战争很缺乏,但国际安全/军事竞争对手的广泛且长期的存在会产生与战争相似的“结构性压力”作用于国家建构,所以推测国际冲突显著地作用于该地区各国的财政能力。他对1975—200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分

^① Thomas Gschwend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eds., *Research Design in Political Science: How to Practice What they Preach*, p. 14

^② Ingo Rohlfing, *Case Studies and Causal Inferen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9-12.

^③ Cameron Thi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te Building in Sub-Saharan Africa,”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9, No. 3, 2007, pp. 716-731; 卢凌宇:《战争与撒哈拉以南国家建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1期,第4—39页。

析表明,国际对手显著促进了国家财政汲取能力。

卢凌宇的基本假设是对手并不显著地作用于该地区的国家建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对手产生的结构性压力远远低于大规模的长期战争带来的那种灭顶之灾感;二是国家间对峙往往发生在国家能力难以有效接触和控制的边境地带,而大量人口居住在中心城市,所以很多国民实际上很难切身感受到对手的威胁;三是长期低烈度的对峙会让国家和国民都产生精神疲劳,削弱对税收、监督和信息等官僚机构的建设,同时降低由外在威胁产生的纳税意愿。

虽然两位作者都使用面板修正标准差模型(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rors Models),但卢凌宇论证了族群分裂程度、自然资源依赖和外来援助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战争与国家建构的干预作用,并在模型中设置了它们与国际对手的交互变量,从而推进了蒂斯的研究。卢凌宇经验分析的时段是1975—2013年,基本发现是国际对手并不显著地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汲取能力。此外,三个干预变量都显著地削弱了战争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汲取能力的促进作用。随着族群分裂程度上升,超过一定的阈值,国际对手对战争的国家建构效果作用由积极转为消极;相比之下,自然资源依赖和外来援助则始终起到显著的负面作用。相应地,我们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也对上述解释变量予以重点关注。然而,由于埃塞和索马里都不属于出口石油、天然气、贵金属或钻石的“食利国家”,故在分析中可以排除这个因素。

近些年,对蒂利模型的研究存在两个不足之处:第一,在以大样本分析为主的经验研究中,因变量设置严重向国家能力倾斜,对国族认同这个广义国家建构的半壁江山重视不足。不过,桑巴尼斯(Nicholas Sambanis)等在较近的研究中发现,发动国际战争确实能够显著地增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民族凝聚力,比如普法战争中的德国。^①也有少数学者在比较个案研究中融合了汲取能力和国族认同这两个变量,比如赫布斯特对非洲国家建构、桑地诺对拉丁美洲国家建构和泰勒与博泰亚对内战与越南和阿富汗国家建

^① Nicholas Sambanis, “Nation-Building through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9, No. 2, 2015, pp. 279-296.

构的研究^①,本文也做同样的选择。第二,重战争形式,轻战争过程。鲍特曼(Christopher Baltzman)和米格尔(Edward Miguel)在论及战争与国家的关系时指出,两者之间没有简单、普遍的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可能依赖于战争的起因、方式和结果。^②所以,我们试图追踪战争和战备对埃索两国国家建构产生影响的过程,尝试提炼出它们作用于因变量的因果机制。

重结果、轻过程是该研究纲领的推进过程中大量使用统计工具的结果。尽管定性和定量研究都旨在探讨因果关系,但从研究设计的角度来说,这两种因果关系的性质是不一样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见表1。^③

表1 社会科学研究设计的类型

| | | 因果推理类型 | |
|-----|-----|-----------|-----------|
| | | 因素中心 | 结果中心 |
| 观察数 | 大样本 | (2)统计分析 | (1)定性比较分析 |
| | 小样本 | (3)比较个案分析 | (4)单一个案分析 |

表1的观察数是针对统计样本的大小而言的。根据因果关系的类型,研究设计分为两类:因素导向(factor centric)和结果导向(outcome centric)。因素导向研究设计的特点是忽略过程或者把过程视为一个黑匣子,只考察在控制阶段前后,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大小和方向,X只是Y的一个必要条件。相比之下,结果导向设计的特点是通过使用不同的自变量组合,对因变量做出充分的解释,要求细致地描述X作用于Y的过程,X(多个自变量

^① Jeffrey Herbst, "War and State in Africa," pp. 117-139; Brian Taylor and Roxana Botea, "Tilly Tally: War-Making and State-Making in the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 pp. 27-56. 值得一提的是,泰勒和博泰亚还把军事/强制能力用作国家建构的一个子变量。我们认为,汲取能力可以被视为强制能力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强制能力可以被视为汲取能力的一部分。可参考 Bethany Lacina, "Explaining the Severity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0, No. 2, 2006, pp. 276-289.

^② Christopher Baltzman and Edward Miguel, "Civil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8, No. 1, 2010, p. 27.

^③ Thomas Gschwend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eds., *Research Design in Political Science: How to Practice What they Preach*, p. 14

及其组合)是 Y 的充分条件。相较于其他三种分析类型,比较个案虽然以寻找必要条件为使命,但如果个案数量较少尤其是只有两个个案时,进行一定程度的过程追踪是完全可能的。

与大样本统计分析相比,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会来获得对正在调查的现象的详细了解”^①,既能使研究者一窥黑箱的究竟,确定结构与结果之间的中介变量,在理想状态下甚至能让研究者“看到”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互作用。^②社会科学案例分析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以尽可能少的案例做出尽可能多的解释。鉴于此,研究者应该选择背景尽可能相似的案例。^③如果有一到两个案例具备准实验性质,研究者就能做出很多解释,其效率超过上百个偏离理想实验状态的案例。^④

本文选取了埃塞和索马里这对最相似案例(most-similar case)。在战争爆发前,两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都很相似。在经济上,埃塞和索马里的经济基础都是农业,工业基础都很薄弱。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后,索马里的工农业虽然发展并不稳定,但都十分迅速,国内资本显著增加。^⑤埃塞的社会主义改革虽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农业的发展质量相对较低^⑥,工业则相对发展缓慢^⑦。在政治上,两国都向军政府转变。埃塞从帝制转变

① David Collier, James Mahoney and Jason Seawright, “Claiming Too Much: Warning about Selection Bias,” in David Collier and Henry Brady, eds.,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p. 87.

② Carles Boix and Susan Stoke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03.

③ James Mahoney and Gary Goertz, “The Possibility Principle: Choosing Negative Cas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No. 4, 2004, pp. 653-669.

④ Carles Boix and Susan Stoke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p. 112.

⑤ Abdi Ismail Samatar, *The State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Northern Somalia, 1884—1986*,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p. 121.

⑥ Keith Griffin ed., *The Economy of Ethiopi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p. 22-25.

⑦ Andargachew Tiruneh, *The Ethiopian Revolution 1974—1987: A Transformation from an Aristocratic to a Totalitarian Aut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89-95.

为军政府,对政治体系和经济结构进行重组,加强了中央集权。^①索马里则从共和国转变为军政府,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改革,反对氏族主义、调和政教关系等。见表2。^②

表2 欧加登战争前埃塞和索马里的情况

| | 埃塞 | 索马里 |
|------|--|--------------------------|
| 经济发展 | 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相对缓慢、质量较低 | “科学社会主义”改革,发展迅速、质量较低、不稳定 |
| 政治发展 | 对政治体系和结构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加强中央集权 | 加强全国意识形态控制、反对氏族主义、调和政教关系 |
| 社会发展 | 强制同化、民族区域自治、阿姆哈拉主义(Amharaism) ^③ | 消除氏族主义、统一语言和文字 |

本文的因变量有两个:一是财政汲取能力。在经验研究中,征税经常被用作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国家能力。^④财政收入是国家履行基本职能的物质基础。^⑤二是国族认同。国家机器的建设和发展能够获得现代国家的外观和形式,然而只有当国家获得国民的认同和支持时,政治制度和国家机器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国族建设是政府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方式。政府往往会给国民描绘美好的未来图景,也会借重传统、旧制度和习俗来定义国族特色,目的是动员民众支持国家或政府的政策主

① John Herbeson, “Socialism, Traditions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Ethiopia,”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11, No. 2, 1997, pp. 217-234.

② 陈利宽:《索马里社会主义实践及其启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6期,第103—113页。

③ 阿姆哈拉主义主要指强力推崇在埃塞俄比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爱姆哈拉人的文化、宗教以及习惯,认为他们是更高尚的、更先进的。

④ Lingyu Lu and Cameron Thies, “War, Rivalry and State Building in the Middle East”, pp. 239-253.

⑤ Alberto Alesina and Eliana La Ferrara, “Ethnic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63, No. 3, 2005, pp. 762-800.

张。^①因此,在战争对国家建构的影响上,本文主要聚焦于两个机制^②:国家从社会中汲取资源的能力和建立广泛国家认同的能力。

我们的双个案比较分析的优点之一是研究对象经历过同一场战争,属案例内比较(within-case comparison),回避了不同类型战争或不同战争特点对参战国的跨案例(cross-case)影响。同时,同一场战争中出现了胜方和败方,这对于拓展蒂利的“战争驱动模型”提供了天然的便利,类似于自然实验,不仅有利于提高案例分析的内部有效性,同时还能兼顾理论的外部有效性。^③不仅如此,在选定的时段内,埃索两国都没有经历过会对欧加登战争或国家建构产生显著影响的国内冲突,从而避免了内生性问题。相比之下,泰勒和博泰亚的结论之所以难以让人信服,原因是他们选择的自变量是国内战争,但在这期间,越南还经历了越南战争、越柬战争和中越战争,阿富汗则经历了阿苏战争,而两位作者并没有把两类战争的作用分离开来。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双个案比较分析具有实现过程追踪的优势,但过程追踪需建立在丰富资料的基础上。然而,在本研究中,欧加登战争只持续了不到一年时间(1977年7月—1978年4月),同时关于埃索两国在战争期间国内变化的史料十分稀缺,所以我们无法做到展现欧加登战争对两国国家建构影响的全过程,只能部分地进行过程追踪,无法将战争作用于国家建构

① Raphael Utz, “Nations, Nation-Building and Cultural Intervention: A Science Perspective,” *Max Planck Yearbook of Nations Law*, Vol. 9, No. 1, 2005, pp. 615-647.

② 本文认为机制(mechanism)是某种效应产生的过程或路径。学者们对机制的定义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单元层次的定义和结构层次的定义。机制在单元层次被定义为一个实体或变量。例如,有学者认为机制是一个具有某种不变的特性并且有能力改变其生存环境或引起某种经常性变化的实体。在结构层次上,机制被定义为一个过程。有学者指出,机制就是经常发生和容易被识别的因果模式,这种模式通常在未知的条件下被触发或者产生中介影响。参见 Janet Box-Steffensmeier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22; Mario Bunge, “How does it Work? The Search for Explanatory Mechanism,”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34, 2004, pp. 182-210, 等等。

③ Dan Slater and Daniel Ziblatt, “The Enduring Indispensability of the Controlled Comparis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6, No. 10, 2010, pp. 1301-1327.

的黑匣子完全打开。^① 不过,对欧加登战争与埃索两国的建构进行比较个案分析,仍然有助于我们克服“战争驱动模型”中提到的重战争形式、轻战争过程这一结构性缺陷,加深对战争与国家建构关系的理解。

三、欧加登战争与埃塞国家构建

埃塞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在1936—1941年被意大利短暂控制外,一直保持着政治独立。1974年发生军事政变,皇帝塞拉西(Haile Selassie)被废黜,国家政权被军政府掌握。

(一) 财政汲取

1. 战前财政汲取状况

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改革虽然加强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但政府机构普遍效能低下,经济增长乏善可陈。^② 军事政变后,埃塞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政府对官僚机构的改革具有很强的实用性。^③ 政府对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进行国有化改革。总体而言,军政府的财政状况相比帝制时期有所改善。

在财政相关制度建设方面,政府于1975年强制推行土地改革,同时对重要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例如,将城乡土地国有化,并把这些土地分配给农民。政府还兴办了大量国营农场,并稳步扩大其规模。通过土地改革,埃塞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旧的地主精英,推动了中央集权的发展。^④ 到1977年,政府对农产品的销售和运输掌握了较高的控制权,能够严格制定并执行

^① 也有学者通过对事件发生前后的新闻报道、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公文等一手资料和二手材料的解读,将事件的过程比较完整地还原出来,比如 Filip Reyntjens, *The Great African War: Congo and Regional Geopolitics, 1996—200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这是从事深度个案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学习的榜样。

^② 萨义德·阿德朱莫比著、董小川译:《埃塞俄比亚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9页。

^③ John Herbeson, “Socialism, Traditions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Ethiopia,” pp. 217-234.

^④ Christopher Clapham, *Transformation and Continuity in Revolutionary Ethiop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61-170.

生产配额和价格控制。^①此外,政府还对工业、住房、银行、保险公司和大型企业等实行国有化,规定每个国营企业制定的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方案在实施前必须上报财政部审批。^②

在经济发展方面,土地改革影响的范围有限。比如,土地再分配很难改变北方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对游牧业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③即使是在情况较好的南方地区,该政策也抑制了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农业增长缓慢,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仍然很低。事实上,在1974—1977年,人口大约以年均2.6%~2.8%的速度增长,而粮食作物产量增长率年均只有1.26%,表明人均粮食总产量在下降,而且粮食产量的增长也只是通过扩大耕种面积而不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获得。^④即使是在农业年景最好时,埃塞也只能勉强做到粮食自给。政府并没有统一的工业政策,尽管国有企业数量大幅增加,但它们的效率都很低。企业主要集中在首都周边或中部高地,地区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⑤国有化措施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虽然政府对私有银行和保险公司实施国有化,但银行规模相对较小,国家通过银行筹集到的可用资本也很少。^⑥

总体而言,在战争爆发之前,政府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加强了国家权力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渗透,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对社会控制程度的提高并不足以使埃塞能从社会汲取更多的资源,财政能力非常有限。

2. 战争期间财政汲取状况

由于战争持续时间相对较短,而且资料也有许多不一之处,要确切地回

^① Marina Ottaway, "Introduction: The Crisis of the Ethiopian State and Economy," in Marina Ottaway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thiopia*, New York: Praeger, 1990, pp. 1-10.

^② 任泉、永久:《埃塞俄比亚革命后的经济发展及存在问题》,载《西亚非洲》,1984年第6期,第18—23页。

^③ Patrick Webb and Joachim Braun, *Famine and Food Security in Ethiopia: Lessons for Africa*,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Ltd., 1994, p. 45.

^④ Keith Griffin ed. *The Economy of Ethiopia*, pp. 22-24.

^⑤ Aaron Tesfaye,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The Case of Ethiopia*,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47.

^⑥ Andargachew Tiruneh, *The Ethiopian Revolution 1974—1987: A Transformation from an Aristocratic to a Totalitarian Autocracy*, p. 89.

答战争期间埃塞汲取能力的变化是不可能的。^① 在战争期间,军队人数从4万~5万人迅速增加到22万。兵员大幅增多以及武器装备等消耗使政府财政压力巨大,政府不得不将财政预算向军事部门大幅倾斜。在此期间,埃塞的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预算的47%左右。^② 此时,埃塞的财政政策还面临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经济中增加政府收入。然而,战争的爆发已使政府在全社会大幅度调高了税率,高额的税收让民众不堪重负,而且也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战争优先原则下,原本不发达的运输系统被用于优先运送军事物资,大量粮食、医药和生产物资等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资则因无法及时运送,在码头堆积甚至腐烂。^③ 二是当局对官方的实际支出并不了解。^④信息的不对称削弱了埃塞制定合理预算的能力,同时加剧了腐败的发展和资金的紧缺。

3. 战后财政汲取状况

战后,政府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从1978年起,在全国开展经济发展运动。与战争前相比,国家权力更加深入经济各领域,公有制企业牢牢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府进一步扩大了合作社经营的领域。^⑤ 在农业方面,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保证货物自由流通、取消价格控制,并确保对土地的安全占有。^⑥政府不仅规定了农产品的价格以及农民应上缴的额度,还推行“村居化”(villagization)政策,强迫农民搬到既定的村庄定居,对农民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进行严密控制。^⑦

国营企业在战后初期效率很高,为企业所得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⑧

① Gebru Tareke, *The Ethiopian Revolution: War in the Horn of Af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13.

② 任泉、永久:《埃塞俄比亚革命后的经济发展及存在问题》,载《西亚非洲》,1984年第6期,第18—23页。

③ David Korn, *Ethiop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38.

④ Keith Griffin ed., *The Economy of Ethiopia*, p. 19.

⑤ Ibid., p. 92.

⑥ 萨义德·阿德朱莫比著、董小川译:《埃塞俄比亚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56页。

⑦ Leenco Lata, *The Ethiopia State at Crossroads: Decolo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r Disintegration*, Lawrenceville, NJ: Red Sea Press, 1999, p. 195.

⑧ Christopher Clapham, *Transformation and Continuity in Revolutionary Ethiopia*, pp. 124-125.

1982年国营外贸公司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79%，而1974年时才只占6%；出口额所占比例也从1979年的37%增长到1982年的70%。^① 1980年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从1974年的6.3%增至8.6%。^② 见图2。但各个行业间的发展并不平衡。^③ 在农业方面，1978—1981年农业生产增长了7%。农产品出口关税收入从1974年的5450万卢比增长到1981年的2.293亿卢比，占中央政府总收入的12.8%。^④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农业产量却以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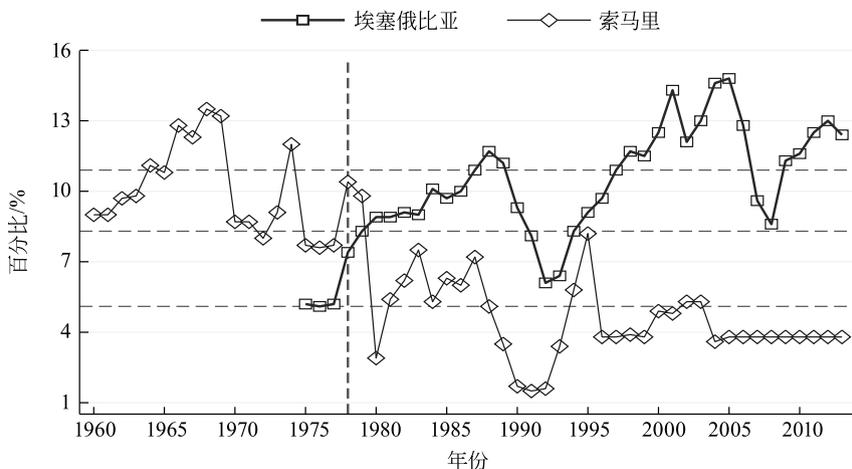


图2 政府税收占GDP的百分比(1960—2013年)

注：本图由作者绘制。数据来源于 Jacek Kugler and Ronald Tammen, *Performance of Nations*, Lanham, Plymouth: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2。其中，1960—1975年埃塞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数据有所缺失。但有文献信息表明，埃塞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在1960—1973年曲折增长，同比稍低于索马里。^⑤

① 任泉、永久：《埃塞俄比亚革命后的经济发展及存在问题》，载《西亚非洲》，1984年第6期，第18—23页。

② Wilson Prichard, *Taxation, Responsiveness and Accountabil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Dynamics of Bargai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66.

③ Roy Love, "Funding the Ethiopian State: Who Pays,"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 44, 1989, pp. 18-26.

④ Roy Love, "Funding the Ethiopian State: Who Pays," pp. 18-26.

⑤ Selamawit Gebreegziabher, "Effects of Tax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Economic Growth in Ethiopia," in Almas Heshmati and Haeyon Yoon, eds.,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Ethiopia*, Singapore: Springer, 2018, pp. 87-104.

年平均 0.8% 的速度下降。如何让本国人民过上“吃饱饭”的日子仍然是政府要考虑的首要问题。^①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埃塞不少地区饥荒频发,政府以及国际组织不得不将援助大量用于人道主义救援上。依靠外来援助也无法应付经济下行、外汇匮乏以及国防开支剧增等挑战。政府试图采取一些保守的理财措施,比如提高进出口税率、发行国债和冻结政府高级官员工资等,但这并不足以缓解财政压力。1986 年,苏联中断了工业援助,埃塞旋即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二) 国族建设

1. 战前国族建设状况

埃塞是典型的多民族、多宗教和多语言国家,民族问题具有地缘政治性、复杂性和冲突性等特点。^②相对于非洲其他国家,埃塞的国族问题更多地体现为在统一国家认同之下的民族关系。20 世纪以来,埃塞的国族问题集中于如何实现权力和资源的平等分配。在战前,埃塞大部分地区都爆发了叛乱。塞拉西政府强制推行同化政策,将“阿姆哈拉主义”等同于“国家主义”,并大力倡导,激起了人们的愤怒。

在民族矛盾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军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缓和民族矛盾,如让更多的非阿姆哈拉族人士入职政府。军政府借鉴苏联的民族理论,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③然而,在执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际过程中,政府的激进政策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从 1974 年起,不少地方就出现了反政府武装;到 1977 年,全国所有 14 个行政区域都发生了不同形式的叛乱活动。^④

^① Alexander De Waal, *Famine Crimes: Politics and the Disaster Relief Industry in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6-126.

^② 施琳、牛忠光:《埃塞俄比亚民族关系与民族治理研究》,载《西亚非洲》,2013 年第 4 期,第 20 页。

^③ 施琳、牛宗光:《埃塞俄比亚民族关系与民族治理研究》,载《西亚非洲》,2013 年第 4 期,第 25 页。

^④ 萨义德·阿德朱莫比著、董小川译:《埃塞俄比亚史》,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52 页。

2. 战争期间国族建设状况

欧加登战争是埃塞革命政权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外部挑战。面对索马里的入侵,历史上曾与政府离心离德的各个部族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战争极大地激发了埃塞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民众被政府广泛地动员了起来。^①面对索马里的入侵,埃塞军队中的派系主义迅速消失,数以千计的退伍军人重返战场。民众面对外来入侵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决心和勇气震惊了索马里和埃塞两国的领导层。^②尽管民族间一直存在矛盾,但在面对索马里这个外部敌人时,他们暂时放下了彼此间的仇恨,携手共击外敌。

但是,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也夹杂着抱怨。战争的爆发促使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战争产生的负担日益沉重。虽然公开抗议闻所未闻,然而人们对政府的不满却与日俱增。^③政府在战争初期的节节败退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社会政治问题(比如治安持续恶化、生活物资急缺和执政暴力化等)为反叛组织提供了重要机会。在政府疲于应对索马里进攻的时候,反叛组织间建立了密切关系。^④政府在对抗索马里的同时不得不抽调部分资源以应付国内此起彼伏的叛乱。

3. 战后国族建设状况

军事胜利恢复了埃塞的民族自豪感。但从中长期来看,战争胜利对其国族建构的作用有限。无论是在战前还是在战争期间,埃塞军事实力快速的提升严重依赖苏联等国的援助。外国援助可能玷污了国家的荣誉。^⑤而且,战争的胜利巩固了军政府的独裁,强化了执政的暴力倾向。战争一结束,政府就对反叛武装实施打击,虽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并没有完全消灭这些独立武装。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格雷地区发生严重饥荒,政府以救荒为借

① Christopher Clapham, *Transformation and Continuity in Revolutionary Ethiopia*, pp. 61-62.

② Gebru Tareke, *The Ethiopian Revolution: War in the Horn of Africa*, p. 213.

③ Christopher Clapham, *Transformation and Continuity in Revolutionary Ethiopia*, pp. 153-156.

④ John Young, *Peasant Revolution in Ethiopia: The 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1975-19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8.

⑤ Gebru Tareke, *The Ethiopian Revolution: War in the Horn of Africa*, p. 216.

口实行“重新安置”计划,强行将150万北方人驱赶到南方地区。政府军包围了村庄和集市,采用袭击、绑架等暴力手段将人们集中起来运往安置地。^①

为了消除民族间的紧张矛盾,政府颁布了《埃塞俄比亚国民革命纲要》,正式承认埃塞民族构成的多样性与自治权利,然而该《纲要》只是停留在文字上,并未付诸实践。作为扫盲计划的一部分,政府试图将地方族群语言纳入全国“语言普及计划”中,但效果并不好。^② 强制同化政策的长期实施使其他族群语言的发展严重受限。阿姆哈拉人依然占据着政府的大部分高级职位,掌握阿姆哈拉语仍然是成为高官的必要条件。^③ 任何倡导非阿姆哈拉文化和语言的行为都被冠以“狭隘民族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军政府时期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未能有效地提升国族认同,但对之后埃塞联邦政府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借鉴作用,为埃塞缓和国内民族矛盾、实现族群间和平提供了一个图景。^④

(三) 小结

欧加登战争对埃塞国家建构产生了积极作用。为了筹措更多的战争经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渗透。然而,这种国家建构建立在依赖外来援助的基础上,不利于国家能力的长期发展。一方面,大规模外来援助的涌入削弱了政府努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政府部门机构效能的动力。另一方面,外来援助并不稳定,援助的大小、方向以及援助附加的要求都会随着援助国国内以及世界局势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外来援助的减少和中断,埃塞的发展很快陷入了困境。

战争激发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战争胜利更是鼓舞了国民士气。然而,这场胜利实际上是依靠外来援助取得的,外援因素为国家荣誉蒙上了灰尘。

① Alemseged Abbay, *Identity Jilted or Re-Imagining Identity: The Divergent Paths of the Eritrean and Tigrayan Nationalist Struggles*, p. 133.

② 张湘东:《埃塞俄比亚联邦制:1950—2010》,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

③ Andargachew Tiruneh, *The Ethiopian Revolution 1974—1987: A Transformation from an Aristocratic to a Totalitarian Autocracy*, p. 251.

④ John Abbink, “The Ethiopia Second Republic and the Fragile ‘Social Contract’,” *Africa Spectrum*, Vol. 25, No. 11, 2006, pp. 1-21.

战争的爆发为国内叛乱提供了机会窗口。此起彼伏的国内叛乱对我们考察欧加登战争对埃塞国家建构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干扰。然而,埃塞国内绝大多数叛乱在欧加登战争前就已存在,到1985年时,多数叛乱才基本平息。^①这些叛乱总体而言强度和烈度并不大,但它们可能降低了国际战争对埃塞国族建构的积极作用。

四、欧加登战争与索马里国家构建

索马里位于东非之角,具有重要的地缘地位。自19世纪中后期始,英法意相继瓜分索马里,建立了不同的殖民政权。1960年,索马里共和国成立。1969年,巴雷发动军事政变成立军政府,索马里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一) 财政汲取

1. 战前财政汲取状况

在财政相关制度上,1970年,政府宣布推行“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和1971—1973年的三年发展计划。国营部门在农业领域迅速扩大,各种生产活动基本由国家垄断。1973年政府对大部分土地进行了国有化,并建立合作社。虽然政府通过合作社努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农村地区,但权力依然集中在城市地区。从国有化的范围、政策以及程度来看,索马里中央权力对社会经济的渗透和控制与埃塞不相上下,但在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渗透和控制上,索马里更胜一筹。

政府采取了激进的国有化政策,设立了一系列全国性机构。1971年对玉米和高粱实行统购统销,1973年将统购统销的范围扩大到油料,并先后对畜牧产品、石油和生活用品等物资的进出口实行国家垄断。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北方实施歧视性的经济政策。中央政府不愿意投资发展北方急需的畜牧业、公共工程和工业,这个时期整个北方获得的发展投

^① Karl DeRouen and Jr., Uk Heo, *Civil Wars of the World: Major Conflicts since World War II*,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7, pp. 356-363.

资仅为南方的10%。^①歧视再加上北方氏族对南方的普遍敌意使中央政府很难将权力渗透到北方。

在经济发展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革,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1970—1977年GDP年均增长率为6.18%,其中1975年的增长率更是达到30%。然而,发展不稳定,在短短的8年间有3年是负增长。^②农业仍然是经济支柱,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年均超过50%。^③土地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并没有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因饥荒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仍然会不时出现。畜牧业也没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产量不稳定。此外,受干旱影响,在城市地区定居的人数显著增加。人口结构的变化增加了对谷物的相对需求,粮食进口量大幅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国际粮食援助成为索马里的经济支柱之一。^④

工业发展则相对迅速。在1970—1977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60年代年均的7.7%增加到13.2%。^⑤尽管如此,工业发展仍举步维艰。工业分布很不平衡,全国近半数企业分布在首都及其邻近地区。国有化并不彻底,私营经济仍占据主要地位。^⑥在整个改革阶段,工业发展严重依赖外来援助。^⑦尽管如此,由于政府一直在社会经济领域强制推行国有化,将国家权力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的各角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在大多数时候

① Cabdirxmaan Jimcaale, "Consolid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in WSP International ed., *Rebuilding Somaliland: Issues and Possibilities*, Asmara: Red Sea Press, 2005, pp. 49-122.

②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view=chart&locations=SO>,访问时间:2021年5月29日。

③ 同上。

④ Anne Thomson, "Somalia: Food aid in a long-term emergency," *Food Policy*, August, 1983, pp. 212-217.

⑤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IND.TOTL.ZS?view=chart&locations=SO>,访问时间:2021年5月29日。

⑥ Robert Patma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Horn of Africa: The Diplomacy of Intervention and Disengag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86.

⑦ Elizabeth Schmidt, *Foreign Intervention in Africa: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48.

都有提升,索马里在战争爆发前的汲取能力还略高于埃塞。

2. 战争期间财政汲取状况

在汲取制度方面,一方面,政府调整了货币政策,实行自由货币政策。结果是汇率不断上涨,极大地助长了国内通货膨胀和商贸管理部门的腐败。^① 政府实际上停止了对国内收入的控制,放弃了批发贸易国有化和对基本商品定价的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对生产和贸易依旧征收高额税收,这使不少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甚至倒闭。^②

这一时期索马里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通货膨胀严重。1977年和1978年的生活成本与1975年相比分别约增长了25.9%和38.77%;粮食进口比重则从1972—1974年的19.8%上升至1977—1979年的40.7%,对粮食进口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③ 在农产品出口方面,肉类需求的增长和这一时期的全球通胀压力推高了牲畜价格,甚至远远高于当时国内的通货膨胀率。^④ 然而,其出口市场份额却在迅速下降。^⑤ 又如,1970—1976年,香蕉年均出口近10万吨,即使是出口量最低的1975年也有近7万吨,而这一时期的年均出口量只有约4.1万吨。^⑥

不仅农业衰落,制造业也在下滑。1976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2.6%,1978年则降至6.9%。^⑦ 70年代中期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20%,到

^① Vali Jamal, "Somalia: Understanding an Unconvent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19, No. 2, 1988, pp. 212.

^② Jamil Ahdalla Mubarak, *From Bad Policy to Chaos in Somalia: How an Economy Fell Apart*, p. 76.

^③ Vali Jamal, "Somalia: Understanding an Unconventional Economy," pp. 230-241.

^④ Abdi Samatar, "Somalia's Post-Conflict Economy: 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Bildhaa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mali Studies*, Vol. 7, 2008, p. 134.

^⑤ Jamil Ahdalla Mubarak, *From Bad Policy to Chaos in Somalia: How an Economy Fell Apart*, p. 34.

^⑥ David Laitin and Said Samatar, "Somal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 No. 30, 1984, pp. 66-67.

^⑦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IND.TOTL.ZS?view=chart&locations=SO>,访问时间:2021年7月8日。

1978年,这种出口几乎不存在。生产同样受到影响,1970—1976年,加工肉类年均出口约3940吨,1977年则降至2419吨,1978年则是断崖式地降至39吨。^①而且,随着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恶化,外来援助流量大幅减少。^②这沉重打击了索马里的经济。

3. 战后财政汲取状况

战争几乎摧毁了经济。索马里在战后不得不依靠大举外债、接受国外援助和出口农产品来维持基本的经济运行。随着战争爆发,国家结束了对合作社的介入。政府缺乏连贯的发展战略,糟糕的经济以及难民带来的财政负担让政府被迫接受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经济自由化一揽子政策,大大降低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③战后,几乎所有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都在下降,其他作物产量基本停滞不前。^④大多数农民依旧挣扎在温饱线上。牲畜和其他产品的出口严重受阻。1983年牲畜出口总额比1971—1972年下降了30%^⑤,货物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33%大幅降至1985年的6.3%。^⑥到8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已经崩溃。^⑦工业的表现比农业更糟糕,大多数企业未能支付折旧成本,工厂利用资源的能力很低,每况愈下。

此外,外来援助引发了不同群体间激烈的竞争。有条件的国际贷款和援助成为其投资和发展的唯一来源。^⑧80年代前期,索马里几乎所有的发

① David Laitin and Said Samatar, "Somal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pp. 66-67.

② Norman Miller, "The Other Somalia-Part II: Foreign Aid and Local Politics," *American Universities Field Staff*, Vol. 30, 1981, pp. 1-13.

③ 刘易斯著、赵俊译:《索马里史》,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236页。

④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28.

⑤ Ahmed Samatar, *Socialist Somalia: Rhetoric and Reality*, London: Zed Book, 1988, p. 150.

⑥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E.EXP.GNFS.ZS?view=chart&locations=SO>,访问时间:2021年5月31日。

⑦ Catherine Basteman and Lee Cassanelli, eds, *The Struggle for Land in Southern Somalia: The War Behind the War*, London: HAAN, 2003, p. 6.

⑧ Abdi Ismail Samatar, "Somalia's Post-Conflict Economy: 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p. 129.

展预算都依赖外来援助。由于饥荒频发,政府不得不将部分外来援助用于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外来援助的波动导致了国家收入不稳定,索马里从80年代开始拖欠债务。有条件的外来援助还破坏了经济稳定。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索马里先令仅在1984年就贬值了70%以上,通货膨胀率徘徊在100%左右。^①

(二) 国族建设

1. 战前国族建设状况

与大多数非洲国家相比,索马里是非洲国族同质性最强的国家之一。^②我们基本可以排除族群的介入性影响。尽管如此,索马里社会一直被分为北方的游牧民和南方的农牧民,他们具有明显的文化、语言和社会差异。^③自殖民时期以来,政府在国家社会关系方面的能力非常薄弱。氏族主义(clannism)是索马里国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

建国初期,政治团结对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至关重要,但政治精英很少能达成政治共识。^④为了消除氏族主义的影响,政府对地方行政部门进行改革,打破了原有部落、氏族的地域界限。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派驻了由内政部统一管理的军事行政人员,削弱部落和氏族首领的权力^⑤,还通过引进死刑制度取代传统的部族血偿制度等手段抑制氏族主义。^⑥1970年,政府正式颁布法令,取消所有部落首领的头衔和特权,禁止宣传氏族主义,并加强民族团结教育。随着这些政策的强制推行,氏族在民众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

^① Ahmed Samatar, *Socialist Somalia: Rhetoric and Reality*, p. 152.

^② Alexandra Lewis, *Security, Clan and Tribes: Unstable Governance in Somaliland, Yemen and the Gulf of Ade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9.

^③ Mohamed Haji Mukhtar, "The Plight of the Agro-pastoral Society in Somali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23, No. 70, 1996, pp. 543-553.

^④ Abdi Samatar, "Leadership and Ethnicity in the Making of African State Models: Botswana verses Somal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8, No. 4, 1997, pp. 687-707.

^⑤ 刘易斯著、赵俊译:《索马里史》,第196页。

^⑥ Ioan Lewis, *Understanding Somalia and Somaliland: Culture, History,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8.

索马里在1965年仍有95%~99%的人是文盲。由于缺乏统一的文字,教学和政府文件也用不同的语言书写。语言障碍加剧了南北方氏族间的差异,南北方许多官员如果没有翻译的帮助就无法直接互相交流。^①为此,政府在1972年将索马里语(即中部和北部地区的语言,称为 Af-maxaad)作为官方语言。然而此举也将讲其他语言的人从主流政治中分离出来,使中部和北部在文化上逐渐分离。^②1973年,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扫盲运动获得了成功,索马里的识字率从独立前的2%跃升到70年代末的60%。^③语言和文字的统一以及扫盲运动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认同的跨越发展,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在民众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在战前,索马里采用强制手段将氏族成员的身份抹去,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氏族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对提高国民的国家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族主义一度超越氏族主义,成为压倒性的国家意识形态。^④

2. 战争期间国族建设状况

战争激发了索马里人的国族主义。政府与苏联及其卫星国断绝关系的举措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索马里人对苏联这个早前官方的“朋友”极度不满。战争的爆发让这种憎恨得以释放,政府获得了更多民众的支持。政府的每个部门都有“离岗”的公务员^⑤,整个索马里都在关注与收听战争进展的广播报道。民众对战争的热情压倒了对主席巴雷的个人崇拜。^⑥在战争的刺激下,索马里国族主义情绪达到顶峰。南北双方暂时忘记了氏族之间的

① 刘易斯著、赵俊译:《索马里史》,第157—158页。

② Catherine Basteman and Lee Cassanelli, eds., *The Struggle for Land in Southern Somalia: The War Behind the War*, p. 17.

③ 顾章义、付吉军、周海泓:《列国志·索马里 吉布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④ 徐亚莉:《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以索马里为例》,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6期,第92页。

⑤ “离岗”指脱离自己原有岗位转而从事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工作,或者直接上前线作战。

⑥ Ioan Lewis, *Understanding Somalia and Somaliland: Culture, History and Society*, p. 67.

差异与恩怨,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战事上。

但是,战争在提高国家认同的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欧加登地区的欧加登氏族与其附近的伊萨克(Isaaq)氏族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大量难民涌入北方地区反而激化了氏族间矛盾。同时,索马里人的国族主义迅速地穿越了国界,蔓延到肯尼亚和吉布提,不再和中央政府的泛索马里政策保持一致。这种在认同和公民身份上的机会主义加剧了氏族内部的分裂。^①

3. 战后国族建设状况

耻辱性失败给中央政府制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之前被压制的传统部族力量开始复苏。不同的氏族、军方和文官等集团寻找不同的借口为自己洗白。^② 1978年夏,国内越来越多的声音公开批评政府,氏族间冲突此起彼伏,巴雷不得不另寻出路。迫于无奈,巴雷很快走上了氏族政治的回头路。^③ 为杀一儆百,巴雷选择惩罚北部的伊萨克族,这反过来强化了北方人的身份认同,为国家的分裂埋下了种子。^④

难民人数的急剧增加制造了严重的族群问题。大量难民从欧加登地区涌入索马里北部。由于政府未能妥善地解决难民的安置问题,当地人认为难民侵占了他们有限的资源。而且一些难民与原住民之间本就存在着由来已久的氏族仇恨,北方氏族认为中央政府的难民移民政策不公平,目的是诱使其他氏族侵占北方的领地,这强化了北方地区的分裂意识。

在80年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持续紧张。国家对资源的控制能力逐渐下降,精英们开始关注那些以往未曾重视的地方资源(如水资源、油料作物)。^⑤ 由于战争失败和国家崩溃,个人要生存下来,还得依赖自己所属的氏族。

① 刘易斯著、赵俊译:《索马里史》,第223页。

② Ioan Lewis, *Understanding Somalia and Somaliland: Culture, History and Society*, pp. 67-68.

③ 卢凌宇:《“怨恨”、“机会”与国内冲突的发生——基于索马里内战个案研究》,载《国际论坛》,2015年第5期,第62—68页。

④ Dominik Balthasar, “State-Making at Gunpoint: The Role of Violent Conflict in Somaliland’s March to Statehood,” *Civil Wars*, Vol. 19, No. 1, 2017, p. 74.

⑤ Catherine Basteman and Lee Cassanelli, eds., *The Struggle for Land in Southern Somalia: The War Behind the War*, p. 18.

(三) 小结

战败打断了索马里国家建构的进程。政府通过“科学社会主义”改革,增强了国家的汲取能力。然而,索马里的的发展是以大规模外来援助为基础的,这并不能为政府提供稳定的税源,同时还导致国民经济对援助的依赖日益加深。战争爆发中断了改革的进程,摧毁了经济。战后经济凋敝、饥荒频发。简言之,战争消解了战前政府增强汲取能力的努力。

国际战争并不总是促进国族建构,它也可能激化国内民族间的冲突。在战争前,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增进了民众的国家认同。在战争期间,民众更是表现出巨大的爱国激情。然而,人们更倾向于为氏族、部落而非为国家而战。^① 战败使“大索马里”梦彻底粉碎,战前被压制的氏族主义重振,氏族间原本已缓和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五、结论

本文通过探讨欧加登战争对埃塞和索马里国家建构的影响,检验和拓展了蒂利的国家建构的“战争驱动模型”,我们的基本发现在表3做了归纳。

表3 战争与埃塞和索马里国家建构

| | | 埃塞 | 索马里 |
|---------|------|----|-----|
| 汲取能力 | 战争前 | 强 | 强 |
| | 战争期间 | 强 | 弱 |
| | 战争后 | 减弱 | 减弱 |
| 国族主义 | 战争前 | 弱 | 强 |
| | 战争期间 | 强 | 强 |
| | 战争后 | 减弱 | 减弱 |
| 援助的干预作用 | | 强 | 强 |
| 族群政治 | | 强 | 强 |
| 殖民遗产 | | 弱 | 强 |

^① Catherine Basteman and Lee Cassanelli, eds., *The Struggle for Land in Southern Somalia: The War Behind the War*, p. 14.

我们的基本发现是战争对国家建构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这是对蒂利原生模型的一个补充。在原生模型中,战争的国家建构作用始终是积极的。实际上,关于战争非线性影响,巴尼特在对埃及(1952—1967年)和以色列(1948—1977年)进行双个案历史探讨时也发现了类似轨迹。^①非线性影响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是条件性的。

在欧加登战争这个案例中,战争对国家建构的“倒U形”影响可能受制于五个干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外来援助。索马里作为后殖民国家,尚未能建立起基础制造业,高度依靠农业,以分散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导致财政汲取的成本居高不下。在战前,索马里依赖外来援助逐步进行国家建设,汲取能力和国族建设都取得了积极发展。在战后,索马里对大规模外来援助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这削弱了政府改善和发展经济、增强汲取能力的动力。

与索马里相比,埃塞的经济状况较好。在胜利后,政府继续推行社会主义改革,经济确实有了明显发展。不过,埃塞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也严重依赖大规模外来援助。现有经验研究对外来援助对国家建设的影响是利还是有害尚未达成共识,但更多的研究表明外来援助助长了受援国官僚机构的腐败、新庇护主义的发展,并造成宏观经济失衡。^②如果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接受大量的外来援助,埃索两国或许能迫于实际形势对社会作出一些让步,结果将是实现包容式的经济发展并促进国族建构。索马里的索马里兰地区(Somaliland)在1991年宣告独立。由于缺乏外来援助,政府向社会作出各种让步,逐渐建立和巩固了共同身份、促进了族群和解,并实现了包容式的经济增长,国家能力显著提高。^③相比之下,南部地区获得了大量的外来援助,至今战乱不休。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持续的自然灾害,埃塞和索马里相继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所以,外援中有不少被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即使

^① Michael Barnett, *Confronting the Costs of War: Military Power, State, and Society in Egypt and Israel*, pp. 210-243.

^② Joseph Wright, "Aid Effective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Personalism," *Comparative Political Science*, Vol. 43, No. 6, 2010, pp. 735-762; Steven Younger, "Aid and the Dutch Disease: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When Everybody Loves You," *World Development*, Vol. 20, No. 11, 1992, pp. 1587-1597.

^③ Sarah Phillips, "When Less was More: External Assistance and the Political Settlement in Somalil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2, No. 3, 2016, pp. 629-645.

如此,鉴于外来援助的规模以及发挥作用的途径,我们仍然认为大量的外来援助很可能破坏了战争的“棘轮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战争对国家建设的积极作用。

第二个因素是战争延续的时间。蒂利研究发现,欧洲早期国家面临的国际战争长达几十年、上百年,面对外部敌人的长期威胁,国内民众不得不在战争中进行长期的合作与互动,国际战争的发展促进了欧洲国家国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①虽然欧加登战争仅仅持续不到一年,但埃索两国在欧加登问题上长期处于对峙状态。而且,埃索两国并没有因为欧加登战争的结束而进入和平状态,在战争结束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它们一直是国际战略对手。^②蒂斯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对手会像持久的战争那样促进国家建设。^③我们的发现是在面对外部敌人时,埃塞和索马里的民众都表现出极高的爱国热情,尽管在战前不同的氏族/民族之间都有矛盾,但大敌当前,它们都将这些矛盾搁置一旁,共同御敌,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家认同。但在战后不久,索马里氏族间关系再度紧张,甚至比建国初期还严重。埃塞国内的少数民族群也是叛乱不已。这些证据表明,对手和战争对国家建设影响的程度可能确实不同。相较于战争,对手只是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权威等形成威胁,但并没有直接挑战国家的生存,所以它产生的结构性压力较战争而言也小一些。而且,尽管两国在1960—1988年一直是战略对手,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对抗的强度并不高,埃索两国所面临的结构性压力远比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要小得多。由此可见,战争持续时间短和对手对抗程度不高可能削弱了战争对埃索两国国族建构的促进作用。这与卢凌宇对1975—201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构的经验研究的发现相吻合。

第三个因素是战争结果。不同的战争结果对埃索两国的国族建构也产

① 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第126—128页。

② Cameron Thi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te Building in Sub-Saharan Africa,” p. 722.

③ Cameron Thies, “State Building, Interstate and Intrastate Rivalry: A Study of Post-Colonial Developing Country Extractive Efforts, 1975—2000,”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8, No. 1, 2004, pp. 53-72; Cameron Thies, “War, Rivalry and State 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 pp. 451-465.

生了不同影响。战败会对国家内部的集体信心和政府权威等产生有害影响,这种消极情绪会诱使国家领导人和民众采取报复性行为宣泄情绪,以追求恢复原来的地位和声望。^①对索马里而言,耻辱性的战败使“大索马里”的梦想破灭,同时还显示出了中央政府的无能,于是地方不断地向中央的权威发起挑战,氏族主义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相反,胜利让埃塞民众恢复了民族自豪感。不过,胜利是在大量外来援助的基础上实现的,这让国家荣誉蒙羞。不仅如此,国际战争的爆发以及政府在战争初期的节节败退也给埃塞国内原本存在的叛乱提供了机会窗口。

第四个因素是族群政治。无论是在战前还是在战后,埃索两国都一直受到族群政治的影响。在索马里,政府一直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部族化,虽未能完全消除南北方氏族间的矛盾,但已缓和很多。战争激发的国族主义热情加速了氏族间裂痕的消弭。然而,战败以及政府对南方的偏袒和对北方的歧视加剧了北方氏族对南方氏族的不信任。可见,战争对索马里国族建设的最初作用是积极的,但族群政治起了相反的作用。相比之下,埃塞族群政治的情况更不乐观。早在战前,国内叛乱时有发生;在战争期间,相互对立的族群则暂时放下彼此的仇恨,携手抗敌。然而,政府在战后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歧视并没有消失,资源分配仍然严重向主导族群倾斜。尽管埃塞取得了胜利,族群政治对国家建构的消极影响始终未能消除,并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第五个因素可能是殖民遗产。有研究表明,殖民者统治方式会对被殖民国家的国家能力发展产生重要影响。^②19世纪中后期,索马里遭到英法意等国的瓜分,它们的统治方式并不相同。英国在北部地区实行间接统治,保留了当地的氏族政治传统;意大利则对传统的氏族政治存在偏见,尽可能对殖民地区实行直接统治。^③不同的殖民统治方式造成了索马里南北方政治不

^① Josly Barnhart, “The Consequences of Defeat: The Quest for Status and Morale in the Aftermath of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5, No. 1, 2020, pp. 195-222.

^② Stelios Michalopoulos and Elias Papaioannou,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58, No. 1, 2020, pp. 53-128.

^③ Paolo Tripodi, *The Colonial Legacy in Somalia: Rome and Moghadishu from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to Operation Restore H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p. 75, p. 105.

同的发展路径。自此之后,索马里退化为一个严重分裂的社会。即使是在去殖民化多年后,人们忠诚的依旧部落而非国家。^①据此,殖民遗产有可能破坏了战争对索马里国族建设的积极作用。与索马里不同,埃塞除在二战时期被意大利短暂殖民外,一直保持独立,而且意大利在统治期间一直遭到埃塞人民的反抗,并没有留下有影响力的政治遗产。我们的分析表明,殖民遗产并没有显著影响两个国家的汲取能力和国族认同。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对于处于交战或敌对状态的国家而言,殖民统治在何种条件下会对国家建构产生显著影响。

如前所述,埃索两国是长期的战略对手,欧加登战争又是当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历史上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国际战争,但战争最终导致了两国国家建构的倒退。这个发现与蒂斯和卢凌宇大样本分析的结果都不吻合:蒂斯发现对手与汲取能力显著呈正比,卢凌宇则认为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然而,定量分析反映的是平均化的趋势,是森林;而个案研究则体现了个别观察(案例)的特点,是树木。所以,个案研究与定量分析结果不同并不意味着两者相互矛盾,而很可能是定量分析所未能有效识别的干预变量在起作用。蒂斯和卢凌宇都发现族群政治和外来援助显著地削弱国家建构,假如这两个因素不存在,战争的影响是否就会转为积极?

尤其值得追问的是,当我们排除了这两个因素中的至少一个,战争结果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构的影响是否会发生转变?至少对于欧加登战争的双方而言,这个反事实推理是成立的。实际上,对(国际)战争结果的影响的研究集中关注交战双方战争复发或冲突升级或针对第三方的战争发生的可能性。^②有少数学者评估战争结果对国内政治尤其是政权寿命的影响。^③欣诺里(Luis Schenoni)之作可能是唯一一篇直接探讨国际战争结果对国家建构影响的论文。欣诺里的研究对象是1865—1913年的拉丁美洲国

① Jeffrey Herbst, "War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p. 129.

② 可参考下述文献回顾:Joslyn Barnhart, "The Consequences of Defeat: The Quest for Status and Morale in the Aftermath of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5, No. 1, 2020, pp. 196-199.

③ 例如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War and the Fate of Regim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3, 1992, pp. 638-646.

家,发现在战争中获胜巩固了中央集权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财政汲取,比如阿根廷和智利;相反,战争失败导致执政联盟的瓦解,国家的制度化水平被严重削弱,给极端势力上台提供了机遇,国家由此陷入失败国家的恶性循环,比如巴拉圭和危地马拉。^①此外,巴尼特对埃及和以色列的比较个案研究实际也隐含了战争结果的影响:在两国长期的军事博弈中,虽然以色列是胜利者,但双方的国家建构都呈现退化趋势。换言之,在这个案例中,战争结果并不产生显著影响,这条证据与本文在埃索两国的发现相似。

常规科学发展的一个规律是理论的内涵越来越大,理论越来越精致,相应地外延越来越小,理论可解释的现象越来越少。如果说蒂利的原生模型能够解释西欧、东亚以及后殖民世界的国家建构,那么经不断修正和完善的模型所能解释的现实世界的案例/观察数越来越少。随着议题所预留的空白越来越少,学者们在从事大样本分析的同时,逐渐由寻找必要条件过渡到同时寻找充分条件,在方法上逐渐转向了比较个案研究和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本文的经验发现为 QCA 研究提供了富于启发性的素材。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而言,族群政治和外来援助是非洲政治的主要特点,那么外来援助、族群政治以及殖民遗产、战争(对手)持续时间和战争结果的不同组合如何影响这一地区国家的汲取能力和国族认同?埃索两国都不是资源出口依赖型的国家,但这样的国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中东、中亚等广袤的后殖民和第三世界却广泛存在,殖民遗产也是如此。泛言之,这些非撒哈拉以南非洲特色的因素以不同方式组合起来,会对其他第三世界和后殖民国家的国家建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是蒂利开创的国家建构的“战争驱动模型”留给未来研究者的问题。

^① Luis Schenoni, “Brining War Back in: Victor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Latin Ame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5, No. 2, 2021, pp. 405-421. 也有文章探讨国内战争的结果对国家建构的影响,参见 David Sobek and Cameron Thies, “Civil Wars and Contemporary State Building: Rebellion, Conflict Duration and Lutable Resources,” pp. 51-69。